



“史学二陈” 二题

◎胡文辉

20世纪成就最高的历史学家里,有两位陈姓人士,即陈垣、陈寅恪。



陈寅恪的《柳如是别传》,本来拟名《钱柳因缘诗释证》(可视为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之续),是更切合著作的主题和内容的。可能考虑到钱谦益是“汉奸”,出现在书名里太碍眼,才改作今名,让柳如是独自“撑场”。但论效果的话,《钱柳因缘诗释证》作为书名未免学究气,突出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河东君,倒是比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钱牧斋更能吸引眼球的。(孟森有《横波夫人考》《董小宛考》,也是直奔主题,径以明末名妓为论文题目。)

陈垣治史,最重史料,是真正的史实学派,但他指导学生,总要强调文章的写法;他也很重视文章的标题,认为起标题应求醒目,能引人入胜则更佳。他曾写过一篇《切韵与鲜卑》,因为《切韵》的编者陆法言和笺注者孙纳言都是鲜卑族之后——他对这个题目很是得意,还专门向此道的专家周祖谟“隆重介绍”过。

“史学二陈”,都算是标题党呢!



“史学二陈”都很重视史料,但相对来说,陈垣更重视系统、全面地搜集史料,即所谓“竭泽而渔”;陈寅恪则更重视关键史料的理解和运用,也更重视对新史料的挖掘。

陈寅恪对新史料有个著名的看法:必须熟悉旧材料(一般性材料),才能真正利用新材料。因为新材料往往是片断的,必须了解旧材料构成的史实轮廓,才能理解新材料的性质和意义。这其实卑之无甚高论,但确是极重要的经验之谈。

打个比方,新材料只相当于一幅历史拼图里的个别碎片,必须对历史拼图的轮廓有大致的了解,能依据旧材料拼出大致的图案,才能够将新发现的碎片放到拼图中的恰当位置。有时,新材料能有画龙点睛之用,使原来的死材料变为活材料,使史实得以连成一片;但更多时候,新材料并没有自足的价值,只能为旧史实增添一点细节而已。

当然,无论史料增加了多少,永远也是不够的——不可能恰好拼出一幅完美无缺的历史拼图来的。如何理解和使用史料,终究需要我们的“脑补”能力。

就是这样,使用史料的能力,其实就是我们对史料的“脑补”能力。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张新颖

张新颖,1967年生,现代文学学者。



张新颖书房 沈从文研究专家、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的书房里有一股“福气”,“无事此静坐,有情且赋诗”是让人羡慕的生活状态,也反映了书房主人的性情与心境。



“知堂 极爱甜食”

◎谭苦庵

“知堂老人”周作人说,“传说鲁迅最爱吃糖,这自然也是事实”。其实,周作人大抵也好这一口儿。1943年4月,周作人赴苏州一行。伪江苏省府宣传处请之饮茶,沈启无、陶亢德、柳雨生等入陪坐,堂倌送来生煎馒头、盘香饼、蟹壳黄、肉饼、年糕各色茶食,“老人家没有一样不吃他一个二个”。继而“卖方糕的来了”,陶亢德说,“方糕内容、糖重、油多”,但周作人“也要了点”。陶亢德告辞后,“听启无夫人说,知堂极爱甜食”,于是在采芝斋“与雨生合购了半斤轻糖松子留送与他”(《知堂小记》)。《江苏日报》冯节也请饮茶,“吃了不少点心,一客鸡球包,一客叉烧包,此外又来一客春卷,一客蛋糕”,而周作人“胃口实在很不错,大有每种都要试试看样子”(郭梦鸥《知堂老人来苏州记》)。一年以后,周作人还对此念念不忘,“在苏州的两个早晨过得很好,都有好东西吃”(《苏州的回忆》)。

胡竹峰说,“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的书房,原名苦雨斋,后改为苦茶庵,人称他苦雨翁,不离苦味”,可事实上“周作人喜欢的是甜食”,并开列了食单,有蜜麻花等十馀种(《不知味集》)。这些名目大多出自周作人的《南北的点心》,但原话是,“南方茶食中有些东西,是小时候熟悉的,在北京都没有,也就感觉不满足”,没说“喜欢”它们,且松仁缠与核桃缠“并不怎么好吃”。

真正让周作人觉得好吃的甜食是羊羹,其诗有云“吾意重糕饼,稍与常人殊。蒸炼有羊羹,制出唐浮屠”,将之放在首席。当然,羊羹“并不是羊肉什么做的羹”,而是日式点心,“用小豆做成细馅,加糖精制而成,凝结成块,切作长物”(《羊肝饼》),如豆沙糕,以藤村所制最著名,是夏目漱石的“最爱”。据说,在东京时,鲁迅稍有闲钱就去买藤村的羊羹。



偏重思想内涵且有深度的书话

◎董斋

许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王元化的《清园夜读》(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)是“以民间出版的方式得以问世”的。原来,一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准备出版这部书稿,“选题在本社却未能通过”,只好另找关系,“筹资印制”。书是在深圳出的,制版则是在香港。繁体字横排,装帧设计相当考究。内文用的是进口双胶纸,白洁厚实。封面用的是铜板卡纸,深黑的底色上一根峻挺的翠竹,浓重的光影里

几片新叶摇曳。下端四字书名,嵌在砖红色的大理石纹上。我当年得到这么一册初版本,真是爱不释手。

《清园夜读》收录的都是王元化20世纪90年代初潜心读书后的文章。全书分为考释、人物、掌故、书简、序跋五辑,记录的都是他转型期的阅读与思考。李泽厚曾以“思想家淡出,学问家凸显”来概括那个时代,王元化则倡导“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”,显然更进一层。其

实,孔子早就说过: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学术和思想,本来就不可截然分开。若说有些著述给人留下了偏执一端的印象,那也只是作者在某个时期或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有所偏重罢了。

回顾现代书话的历史,有偏重知识的,有偏重趣味的,也有偏重学术的,可偏重思想内涵且有深度的书话,除了周氏兄弟的著作,似乎只有这部《清园夜读》。